

悉尼最初的中國話劇

希 崙

在悉尼人民藝術劇院成立典禮上，她來了，靜靜地坐在第一排的座位上。一襲銀灰色的套裝襯著她彩妝的面龐，耄耋之年的她依然美麗，一種永遠超然的靚麗典雅。她沒說一句話，但誰都知道她的分量。她興奮地微笑著，在為這場隆重的典禮月臺、助陣。

她就是把中國話劇搬

上澳洲舞臺的第一人，澳洲著名文化傳奇人物江靜枝老師。

早在1988年，她和她的先生麥克就組織過一個話劇團。他們排成的中國話劇《雷雨》曾在悉尼上演過四場，轟動了當時的華人文化藝術界。真巧，也是那一年，我在天津電視臺正在寫作三十集電視劇本《風雨麗人》，那個劇還獲得了飛天獎。

江老師曾在中國天津參加過曹禺先生的劇作研討會，之後去了北京醫院拜訪過曹禺先生。曹禺先生見到在他的《雷雨》裡扮演繁漪和周朴園的江靜枝、麥克伉儷，曾誇讚：江靜枝扮演的繁漪正是他心目中的繁漪。歲月無情，三十多年了，這應該是靜

枝老師戲劇藝術驕人的成功。

後來，她還把白樺先生的吳王金戈越王劍古裝戲搬上了話劇舞臺。那是她在悉尼話劇舞臺的又一個創舉。

其實，她在悉尼文化舞臺上的創舉何止於此啊！

那年那月，江靜枝女士作為“澳華藝術節”的主席和策劃人，曾邀請過白樺、光未然等著名作家、詩人、音樂家，為大眾呈現過四十七場精彩的藝術活動。

她發表過七百多篇文學作品，還是《家》、《城南舊事》、《阿Q正傳》、《傷逝》等多部中國影視作品的翻譯。靜枝女士可謂是澳洲華人文化的一塊重量極壓艙石啊！

她似錦繁花，無私無畏，一直全身心地獻身文化事業。她做大事，也做小事，更關愛小人物。在一次幾乎是把身體分做兩半的大手術恢復過

後，頂著疫情未了的風險，她為我做了我個人畫展的策展人。幾年之後，在她又要面對修復手術之前，我搬著電腦去她家，我把自己寫的三幕話劇《和光同塵》的劇本念給她聽，她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和建議。她是第一個知道我想把這出反映新一代華人故事的劇碼搬上舞臺的人，她甚至提出要把她家樓下的屋子用作演員的培訓場地呢。這是一位傳奇藝術家，也是與悉尼人藝的誕生有著纖纖前緣的貴人啊。

她坐在悉尼人藝成立典禮的會場裡，沒有被人介紹，也沒人請她講句話。不管是什麼理由，這不應該發生的忘記和疏忽竟然發生了。這樣的疏忽顯然是良心的譴責所不能夠彌補的。第一個該被重重譴責的人是我。我為之深深愧疚。我懂得，當所做的一切不能被認可和尊重的滋味。

事後，靜枝老師在我的微信上發來了祝賀。靜靜地，如春天悄然抽出的新枝般可人：“悉尼的中國話劇舞臺寂靜了幾十年了，華人們，特別是新一代華人都正在努力創業進入小康，如今人們衣食無憂，重新追求精神生活，真好。為你們喝彩，鼓掌！”

她的喝彩對我卻是淩厲的鞭撻：向前走，怎能夠忘記來路上助力過自己的那個人？在無聲中



古道（外二首）車延高

駝鈴和馬蹄沒有停止過縫補
時間一絲不苟
胡楊林被風裁成風的樣子

炊煙比古道瘦

幾根拴馬樁，拴不住義無反顧的歲月

橫風千里，大漠孤煙寫在昨天的書裡
千里橫風，沒有長河，落日還是圓的

在戈壁，遇到一顆駱駝刺都是莫逆之交

有時，對著不知所云的北風
就能把一碗月光喝下去

舀一桶水，從頭澆到腳

爬到這麼高，氣喘吁吁
來不及掩飾了
茶卡鹽湖越平靜，越要虔誠的低下頭
讓天的鏡子照一照
混了大半輩子，自己現在到底是一副什麼德性
走的時候
舀一桶水，從頭澆到腳
不指望醍醐灌頂了
只想把行走人間時沾染的那些醜陋和骯髒
沖得一乾二淨

心跳

只要活著
草地一直綠，古老的甄房就會替我打坐
請記住
才華橫溢的雅魯藏布江不會枯涸
在日月山下，馬蹄是佛的心跳
如果我的心睜開眼睛看你
菩提可以邀請鐵樹，在最高的雲層上開花



徐希崙女士與江靜枝女士在會上的合照。

愛情小說與民族秘史 ——張小河《愛情日記》序言

（接上期）事後，張春生非常內疚。他慢慢醒悟了：當年所謂的“階級敵人”，都是上頭憑空拍腦袋臆想出來的。這樣做的原因，不是做賊心虛，就是自欺欺人。但到了基層，就成了夜入民宅的土匪行徑了！但他們當時涉世不深，居然就以革命的名義，堂而皇之地做出了如此的惡行。他還由此想到文革初期發生在北京的“紅八月”事件，那些被老紅衛兵打死的老師校長和黑五類及其子女們，他們應該是何其無辜無助無援無語！而那些所謂革命又是多麼地可惡可憎可恨可鄙啊！

這個情節，之所以讓我也深深感觸，震動，是因為我也做過類似之事。那是文革的中後期，城市裡機關、學校的“鬥批改”已經進行得七七八八，而在廣大農村，則要開始著手建立和鞏固基層領導班子。我那段時間被“光榮”地從幹校抽調出，跟著“解放”了的領導，組成工作隊，去農村公社搞運動。這些領導，不知是忘了不久前自己曾經被紅衛兵鬥得死去活來，還是正因為經歷慘痛但幸而得到“解放”，他們要對黨感激報恩，表現得更忠誠更革命對“階級敵人”更無情更心狠手辣。總之，在他們領導下，我們工作隊員的身影即使在村子小巷飄過，也讓地富反壞右分子以及據說被拉攏、腐蝕、變質的原來基層幹部們膽戰心驚，在屋子裡大氣也不敢出一聲。我感悟到，毛澤東的“鬥爭哲學”真很厲害，他充分利用人性的黑暗弱點的確曾經讓他們

心應手，所向披靡，因而對中華民族犯下的罪惡也觸目驚心。

《愛情日記》時間跨度五十年，其間中國發生了許多事，一些還是驚天動地的社會大變故。就說這個愛情悲劇的基本背景吧。這是文革中一場人類遷徙史絕無僅有的從1968年到1978年十年“知青運動”，致使多達一千七百萬城市青少年離開學校上山下鄉安家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對絕大多數知青來說，那段歲月真可謂不堪回首。生活的困難艱苦，思想的困惑壓抑，皆可想而知，無需贅言。讓人痛心的是，當時不斷出現知青死亡事件，還有無數女知青遭受姦污、迫害的案件……最後，經過從1978年12月至1979年2月知青們各種規模的絕食、罷工、遊行、跪求，甚至集體臥軌抗議等等拼死抗爭，中共有關當局終於鬆了口。於是，全國各地出現了洶湧澎湃的知青回城潮，能走的基本上都走光了，其情其景相當悲壯，就像在萬里長天寫上碩大無比的一個問號和一個驚嘆號！然而，對大部分已荒廢了學業不再年青的回城知青來說，命運依然並不美妙。他們八十年代回城之後，又面臨各種新的困難新的悲劇，普遍患上迷失於城市的孤獨感、茫然感、被拋棄感。他們中有人以懷舊心情自悲自歎打發日子；有的面對消費時尚流行的社會生活，呈現一種窘迫無措的姿態；有的對當下各種社會現象嚴重不滿，以至抗拒；有的因與兒女的代際鴻溝被

紛至還來的衝突所壓垮，再後來，大部分知青面臨人生謝幕的時刻……

可以絕對準確地說，知青一代明顯是時代的陪葬品。這場巨大的由毛澤東發動的“社會實驗”是一場浩劫，而與此相應的意識形態教育則是一種利用黨文化慣性所進行的系統的洗腦和欺騙。本來，這些已經是全民族的共識，但歷史的詭譎有時會大大超出人們的預知能力。曾幾何時，曾經被中共作為決議定為鐵案的“十年浩劫”竟然可以搖身一變成了“十年艱辛探索”，那場文革中的“知青運動”又重新美其名曰“青年運動的方向”。這是關係到整個民族命運的歷史大倒退啊！每一個炎黃子孫，即使默不作聲，對此也應該而且肯定在心底裡有所反應。特別是知識份子，包括小說作家。在獨裁專制的絕對權力面前，他們的渺小無力和逼仄顯而易見。但他們既然良知未泯，那麼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寫作，也是一種具有進步意義的抗爭。因為，就如本書作者所立的志向那樣，小說，包括愛情小說，就是要寫出被統治者刻意掩蓋或歪曲的歷史真相，要寫出“民族的秘史和野史”，並以此為基礎，重塑不死的民族精神。

在當代中國文學語境下，“民族秘史”或“野史寫作”通常指向那些試圖通過家族興衰、地方誌式敘事或民間傳奇，來重構被宏大“正史”所掩蓋的、更具生命原動力的歷史真相的作品。這一概念最著名的起點是陳忠實的《白鹿原》，其扉頁也引用了巴爾扎克那句名言：“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這部經典通過鄉土倫理與民間視角的敘

事結構，削弱了革命歷史的目的論邏輯，使共產革命的正當性從“絕對敘事”轉化為“可被審視的歷史命題”。代表性作家與作品還有一些。如：莫言的《生死疲勞》是典型的“野史”風格。它佈置了一個魔幻境界，通過六道輪回觀察當代中國農村的變遷，對中共建政後五十年全部政策措施作了全方位的揭露和批判。又如閻連科的代表作《丁莊夢》和《受活》。前者以上世紀九十年代河南地區因非法賣血導致愛滋病氾濫的“艾滋村”事件為背景，利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在書寫這場災難時揭示了在這個“丁莊”極端環境中人性的荒謬與愚昧，直接觸及了政治敏感的社會議題。後者《受活》以荒誕化的敘事策略，顯示人性與生存狀態在大躍進、人民公社、三年大饑荒這些敏感歷史時期的極端扭曲，是其宣導的“神實主義”風格創作的代表作。

這類寫作在二三十年前達到巔峰。它打破了非黑即白的敘事框架，讓文學不再是官方正史的傳聲筒，從而展現了歷史進程中複雜的人性陰影和文化韌性，具有高度的極其珍貴的文學價值與認識價值。然而，在當代中國文學中，具備明確“歷史對抗意識”的嚴格意義上的“民族秘史和野史寫作”的作家，其實是少數派，在今天中國嚴峻政治環境下，更幾乎成了絕響。也正因為如此，張博士企



張小河博士中短篇小說自選集《愛情日記》封面。

圖把他的愛情小說與民族秘史和野史寫作融會貫通，使之相映生輝，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當然，這需要下很大的功夫，例如，現在不到七萬字的《愛情日記》就顯得單薄，比較粗線條，如能發展成一部波瀾壯闊的長篇就更好了。

張博士也充分知道這是一項艱難甚至危險的事業。他說：作家不應該期望通過揭示社會真相而得到大眾的擁戴。恰恰相反，他們所能獲得的，也許正是因為揭示了社會的真

相，甚至因為動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團的乳酪，而引起怨恨甚至報復。尤其糟糕的是，就是那些被他們所同情和關懷的弱勢群體，在大多數情況下也往往不理解他們，更因為自己卑微的社會地位得到了確認而倍感沮喪。這就是為什麼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會遭到某些底層人士的攻擊，而寫了大量農民疾苦的閻連科甚至被他的家鄉政府列為最不受歡迎的人的原因。有一個寓言說昏睡的獅子在遭受毒蛇進攻之前，第一個動作是拍死使它驚醒過來的蚊子。而作家，則往往是這些倒楣的蚊子。

但無論如何——“中華民族百年來的巨大而深重的苦難及其根源，亟待世界各地有志氣有才華的華人作家來重新予以審視並加以開掘。”“而未來的文學，只有達到巴爾扎克標準的作品，才能最終被人們認可，並流傳下去。在這種情況下，小說不僅僅是民族的秘史，而且還將因此而塑造民族精神。”

（2026年4月5日於悉尼。）

何與懷

